



Sunzhongshan Yu Xinhaigeming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 增订本 ·

沈渭滨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unzhongshan Yu Xinhaigeming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 增订本 ·

沈渭滨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沈渭滨著. —2 版(增订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10246 - 0

I. ①孙… II. ①沈… III. ①孙中山(1866 ~ 1925) — 人物研究②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K827 = 6②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641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冯念康
插页设计 夏 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

沈渭滨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1.75 插页 6 字数 521,000

2011 年 10 月第 2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246 - 0/K · 1809

定价 68.00 元

谨以此书悼念恩师陈旭麓先生

——作者



孙中山像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教生同志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文

孙中山手书同盟会政治纲领条幅



黄兴像

馮夷擊鼓走黃河銅馬西來風雨昏此地
信陵君墓士祇今誰解救王孫

中華民國元年夏月

黃興



袁詠不遇粵途窮露布習傳罵道通吳楚美
豪氣如日江湖俠氣劍如風能爭海上為先
若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
前趨拜敢稱雄

此為革命前二週
所作偶錄為

清元同志弟山三時民國元年九月距紀念前二日黃興

黄兴手书条幅



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等护送孙中山到上海北站赴南京就职

大總統誓詞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華固中華民國圖謀
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
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
亂民國中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
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三日 孫文

大总统誓词

序 言

杨国强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沈渭滨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后的一部力学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读，获益良多。

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过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

19 世纪的中国人为救亡图改革，由民族主义凝积成一种强烈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饱含着一腔爱国血诚，但在这种观念里，国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会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国家观念本身的浮泛悬空。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其实，当维新变法时潮初起之时，活跃在潮头的人们中间也少有真能深知“国民”本义者。虽说他们手中拿着李鸿章那一代人所没有的民权和民智，但民权民智都是被救亡招来的，目的本在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它们的价值是由国家观念派生出来的。

孙中山也是一个为救亡而图改革者，同样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以民生立义，却又非常明白地表现了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 19 世纪的仁人志士们眼中和心中都没有的。方《民报》发刊之初，正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党人中行时的年头，但他却预言“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比照后来的历史，由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嬗递而引发的历史变迁正是 20 世纪中国的潮流之一。当然，在孙中山作预言的时候，更能够召唤人心的是武装革命。即使是他周围的那个群体里，也很少有人对此热心唱和。真正以社会思潮的形式体现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嬗递的，是十五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立论于改造社会的争

鸣。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思想前潮。虽说后来的争鸣并不以民生主义发露的社会观念为源头,但就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代谢而言,孙中山毕竟在同一个问题上显示了最早的自觉和先觉。

自1911年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与辛亥革命连在一起,在八十多年岁月里成为几代人记叙、探究和反复咀嚼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众多著述曾各见风采地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理解和认知。而孙中山也在后人的笔下获得了一种常新的意蕴。与既有的著述相比,后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富有个性的思考和见解。

历史人物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也只有在时代的衬映之下才会显得清晰。因此,刻画历史人物需要历史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此多有心悟,全书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面地穿织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众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的矛盾、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团伙内部的矛盾。这个过程显出了与历史进化相关的大是大非,也显出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各自身上的长处和短处。孙中山的形象和人格是与他的友朋、同志、论敌相比较而互见的,因此,孙中山的探索、追求、失败、成功,以至其才识性情,喜怒哀乐都见血见肉,形神兼备。

历史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智慧。前者需要审断,后者需要思辨,而审断与思辨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劳动表现出来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叙事之中别出心裁,在记实的同时往往对成说作探求审断,表现了作者读史之际的认真思索。例如“行其所志”一章描述了从檀香山兴中会到香港兴中会的史事,并勘比两会章程,信而有征地提出了一些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中国同盟会”一章则排比史实,对同盟会的组织结构作细密分析,然后指出:“许多研究者和辛亥革命史论著,在谈到同盟会组织体制时,往往只说成立大会时确定的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并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初确定的‘三权分立’经历着一个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的变化过程。”与此类似的审断之见还有不少,它们都显示了作者执意求真的识力和努力,史事的叙述也因之而带上了鲜活的研究气息。与记实相比,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常常更困难一些。这种困难在于:一方面,深藏于史实内里的因果、意义、联系只有通过解释和说明才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解释和说明是主观的,而深藏于史实内里的东西却是客观的。两者之间的一致不能借助于直观,只能借助于

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铺叙史事之中常以可观的篇幅作论，力求发摭义理，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思辨的自觉追求。例如“新世纪的新力量”一章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逐层分析，指出其中的各个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缺乏统一性。“‘联络学界，开导华侨’”一章写出了孙中山和留学生之间的历史感应。“两条战线”一章详论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异同，等等。这些内容都已不止乎纪实，而是表达了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体验和理解。比之叙事，这一类地方更见作史的个性和苦心。

除了审断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沈渭滨先生治学的严肃谨慎。全书不少地方都不作一点游词地标出了作者目前不能给以回答的问题。把原来留在心里的问题写入章节之中本非撰作此书的必有之义。但问题本身也是研究的一种结果，它们与见解一起放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作者在这个题目下已经完成的部分和尚未完成的部分。学术总是与问题结缘的，学术又是天下之公器。因此，见解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问题也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

沈渭滨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但以师门叙先后，他又是我众多的师兄之一。他喜欢热闹，也耐得住寂寞。我在他寓所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其中一半写出了往事的叹喟，一半写出了人生的寄托，可谓甘苦皆备。学者各有气象，坎坷惬意都画出了一个人的情性。他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纪念陈旭麓教授，既说明了学生对于老师长久的怀念，也说明了老师留下的感召力长久地存在于人间。当此学问之道日见落寞之际，这种有志“薪尽火传”的精神无论如何总是令人起敬的。

1993年7月22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辛亥革命是与清王朝“自改革”相反相成的革命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经过长期酝酿而爆发的伟大革命,孙中山是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苦斗争中成为世所公认的革命领袖。

关于辛亥革命的酝酿和准备,很多研究者把目光丛集于辛亥前十年,这当然是应该与必须的。但我认为可以放得更长些,至少应划到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实行“自改革”开始。

“自改革”是晚清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提出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有感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败象,呼吁当道者“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当时的清王朝昏昏噩噩,仍固守老一套。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汉族地方实力派,开始感到坚船利炮的重要,纷纷效法西方,练兵制器以图“自强”,进而办工厂企业以“求富”。洋务活动,得到了主政的慈禧默许,辅政的奕訢支持。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清政府由下而上第一次实行的“自改革”,使中国近代化跨出了一小步。期间,维新派从批评洋务派徒袭“西方皮毛”中脱颖而出,主张把学西技推向学西政,掀起了维新改革运动,社会思潮为之大变。受此影响,光绪帝决心变法,推行新政,开始自上而下的第二次“自改革”。但戊戌维新仅止百日,即被慈禧扼杀。新政措施绝大多数未经实施,成为一纸空文。“树欲静而风不止”,符合进步潮流的改革一旦启动,总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谁也无法阻挡。中经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在帝国主义“追凶”的压力下,既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又不得不捡起被自己扼杀的变法措施,为我所用。于1901年下诏实行“新政”,被迫开始了自上而下的第三次“自改革”。于是,在前两次“自改革”的基础上,改官制、练新军、设工厂、造轮船、废科举、办学堂、奖励工商实业、派遣留学

生等次第推行,到1905年,甚至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地方设谘议局,中央设资政院,实行“预备立宪”等,其广度与深度超过了百日维新。

经过晚清近五十年的三次“自改革”,社会确实有所进步:民族资本有了增长,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形成;新学盛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新潮迭起,从洋务思潮变为维新改良,再变为民主共和,层层推进。尤其是辛亥前十年的“自改革”,正朝着宪政方向渐进,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清王朝的“自改革”,由于主观动机仅是为了维护“万世一系”的统治,尤其是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出于“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结果是“自改革”反而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历史辩证法充分显示了“自改革”走向清王朝愿望反面的各种关节点:

官制改革因着眼于加强中央集权,造成了地方督抚的不满;而推行地方自治,又为督抚抗衡中央集权提供了合法分权的平台。废科举断了广大士子“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士绅被边缘化,清王朝失去了官僚体制不断补充的人才资源;而办学堂,则为新学和新思潮的衍生造成了广阔的空间,新式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编练新军,结果是练出了反叛王朝的革命武装;奖励工商实业只不过是一项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办商会,使绅商结合,创造了“在商言政”,要求发展民族资本的资产阶级新型社团;办新政的经费大多转嫁于民,苛捐杂税日见严重,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尖锐,“民变”频生;“不准革命”,激起了革命反弹,促成民主革命思潮高涨。加上最后三年的清王朝主政者既缺乏宪政改革的诚意,能拖则拖,说变就变,放慢改制步履,蹒跚前行,理所当然地被走向共和的民主大潮冲走。历史表明,虽然同样是前进运动,但走得慢的必然要为走得快的让路。可以断言,没有晚清的“自改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没有依附于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社会思潮沤浪相逐的层层递变,也没有反戈一击的革命化了的新军,更没有被边缘化而挤入谘议局的地方士绅,甚至没有最初拥护宪政最后又对之绝望的君宪派。辛亥革命至少是晚清五十年来长期酝酿与准备的结果,是与清王朝“自改革”本意不同、方向一致、相反相成的革命。它既顺应了结束君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的社会诉求,又反映了新兴民族资本要求发展的愿望。所以它是一场关于全民利益的民主革命,又是代表中国上升时期民族资本要求解除封建主义束缚,寻求发展机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运动也是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运动

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前的五十年中,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在寻求出路,包

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但其中,近代知识分子和被边缘化了的士绅,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政治倾向的异动,尽管与社会思潮的嬗变影响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与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度更有直接关系。

科举制度自隋代大业以来直到晚清,已实行了一千多年,期间固然有很多弊病,但基本上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也是君主专制时代官僚体制得以延绵不绝的人才资源所在。不论种族,不论贫富,只要考试合格,就能入仕做官,补充到相应的体制内担任各级职位,做君下面的臣。当然,捐钱也可以做官,但不是正途,为士林所不齿。废除科举,不啻是绝了士子读书做官的路,破灭了他们延续了千百年来“金榜题名”的理想。既然没有了出路,没有了奔头,那只好找新的出路。

废科举的同时,大办学堂,固然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清政府也颁发了给予留洋归来的“洋学生”和国内新学堂毕业的优等生以“同进士”、“同举人”的奖励章程,表面上给予读书做官的机会,但实际上只是虚衔,很少有人能以此虚衔进入体制内做臣子的。于是大批从新学堂毕业的学生,也要找出路。

士绅和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有影响、最富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不要低估废除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实际上是自己割断了与士子生命相系的脐带,把士子抛给了社会;不要太乐观地估计清王朝兴办学堂的本意,实际上是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原想作为体制内臣子的反叛者。这两类人,疏离朝廷,成了“无父无君”的动乱之原。可以这么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反对和叛离清王朝的政治运动。他们在动乱中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革命,在反清建国的斗争中起了先锋与桥梁的作用,一部分人是革命同路人,也有不少人是为了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当官获取权力。所以,民国政府甫经成立,士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不少人都争相做官,弄得乌烟瘴气,阵营大乱。孙中山明显感到同盟会内部为当官而争权夺利的斗争实在太厉害,弄得他非常恼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一大批旧官僚旧政客“咸与维新”,涌了进去,以致谭人凤把它称为“狐群狗党”,孙中山也说:“党员于破坏成功之后,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纵能以革命党而统一中国,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设。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代替旧官僚而已。”可见,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当官找个人出路而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汪精卫在谋刺载沣前后 180 度的大转变,想一想陈其美排挤上海光复有功的李燮和乃至刺死陶成章,研究一下武昌起义后武汉与上海在组建临时政府问题上的权力之争,分析一下为什么各省諮议局一成立,就有不少士绅挤了进去?就会

明白革命与个人出路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个人找出路并无不可，太想当官而革命，迟早会暴露私心而不利于革命。

我们以往较多地注意于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研究，这当然是必须的。但很少注意于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性的研究，尤其忽视知识分子，包括被边缘化了的士绅，在参加革命、同情革命中的自我扩张和为国家谋出路的同时，为个人找出路的盘算，这样就难以正确了解辛亥时期知识群体的思想面貌和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斗争。

“排满建国”是辛亥革命时期最能动员社会的口号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其中之一就是满汉矛盾。表面上看，清王朝已延续了二百多年，满汉矛盾已不像清初那样激烈尖锐，正在趋于缓和，其实，它仍然像蕴藏在地壳中的一团岩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喷发。就汉族士大夫说，清军入关之初对汉人进行的残暴屠杀，清初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等，都是一道道刻在心头、永远抹不去的伤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基于中国人的民族区隔心理，在士大夫思想中根深蒂固，即使是体制内的汉族高官，满汉之间关系，也是一道不敢逾越的鸿沟，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更不要说体制外的士子了。就广大百姓来说，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政治压迫，目历身受，体察最为直接，要求有所改善也最为迫切，满汉矛盾正在下层社会中激起日益增长的怨愤与不满。革命派就是基于普遍存在的“反满复汉”的社会心理，鼓吹“排满救国”。可以说“反满”是辛亥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最能激扬民心、最能动员社会的口号，比之民主、宪政，下层民众最能听得懂也更能引起共鸣。既然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都从各自的文化心理和现实境遇中有强烈感受，那么，“排满建国”也自然成为激发革命热情的批判武器。立宪派那些秀才们，只看到满汉矛盾正在趋于缓和的表面现象，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是一座民族矛盾的活火山，试图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去批判革命派在“反满”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尽管说得没错，却是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在民族感情转化为政治态度上，输了重要一着。

我们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既不要因为“反满”口号流露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忽视它在动员革命中所起的一定作用，也不应为了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而故意拔高“反满”的性质，抹去它的特色，把它说成是符合民主革命的需要。事实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的狭隘民族主义到“五族共和”的近代国家主义（国族主义）到反帝的民族独立主义（近代民族主义）有一个逐步

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地分析满汉矛盾,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排满”为了建国,一旦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各族在内“五族共和”的新国家建立,满汉矛盾便逐渐淡化。所以,“排满建国”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会党是革命派联系下层社会的纽带

与满汉矛盾相关的,还有会党和革命派的关系问题。以往,我们较多地论说了革命派利用会党作为反清起义的武装力量,较少研究革命派把联络会党作为联系下层社会的纽带及其在发动农村问题上的作用。

早在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革命化期间,湖南留日学生就宣传一种思想,认为中国有上等、中等、下等三种社会,革命派是中等社会的“前列”,会党、军人、劳动者属于下等社会。要实行民族革命,必须以下等社会作为“革命事业之中坚”,“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1]。革命派负有破坏上等社会,卵翼下等社会的责任。他们还转释日本学者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2]。这一思想被后来成立的华兴会、光复会所接受,而早些时候成立的兴中会已在实行。他们都以联络会党为己任,并以会党作为联系下层社会的纽带,证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已懂得动员社会的必要。辛亥革命不完全是“精英革命”,社会也并非没有动员起来。其中,尤以光复会做得最为充分、最为成功。

浙江原是会党林立之区。浙江士大夫的反清传统源远流长。1903年,受“浙学会”东京会议派遣的陶成章、魏兰,遍访浙江会党,并与白布会、伏虎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等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些会党组织,以地域而言,多在浙东、浙西一带;以成员而言,除了破产农民和失业小手工业者外,大多还有当地的农民加入。如白布会多温州客民,双龙会多松阳农民,龙华会在金华亦有不少农民加入,一闻号令,“耕者无不弃耒耜”,踊跃从事。特别是敖嘉熊主持的温台处会馆,直接与农村,尤其是占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半数人口的客民有所联系。光复会成立后,浙江会党更是成了联系市井下层与广大农村的纽带。陶成

[1][2]《游学译编》:《民族主义之教育》,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08—409页。

章在联络会党、发动农村的过程中，还一度提出过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在《龙华会章程》中写道：“赶走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的公有财产，也不准豪富们霸占。”他之所以把反清革命与土地问题联在一起，写进会党章程（其实应是拟议中成立的《革命协会章程》），就是因为浙江会党中有农民，号召会党发动农村，参与反清斗争。后来，主持浙东会党的联络中心，由温台处会馆转移到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秋瑾等更是深入农村，在联络会党和发动农村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组织光复军，并在安庆、绍兴发动了反清起义，虽然失败，光荣牺牲，但因为光复会扎根在社会底层，会党联系农村的纽带关系还在，光复会才得以重建，继续参与反清革命。以往由于国民党制造正统史观，光复会联络会党、发动市井和农村的斗争史实，被忽视甚至湮没。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特别是浙江的学者做了许多踏实而深入的发掘，光复会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我认为进一步研究光复会与下层社会特别是其与农村的关系还需加强，这不仅是正确论定光复会历史的需要，而且关系到“辛亥革命有没有农村发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历史解读。

会党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相结合，是会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革命派注意了会党与下层社会的天然联系，却没有也不可能去改造他们流氓无产者固有的恶习。革命成功后，会党恶习急遽膨胀，最终沦为社会恶势力而成为反对革命的工具。

“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从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且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推进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中华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儒学自孔子首倡，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宋明理学，已趋于极致，既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驱力，也难以应对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与社会转型的需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面临着历史性转折的关口，近代志士仁人，对中华文化转型所作的努力，都无法使中华文化更新，难以形成理论体系，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成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转型的第一推手。他不是儒士，但他能以中西学问兼备的通识，对儒学“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术，作了推陈出新，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指归的理论体